



我是从孤儿院来的

陈 爱 莲



我是从孤儿院来的

陈 爱 莲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聯书店

我是从孤儿院来的

封扉设计：尹凤阁

封扉木刻：姜 庚

我是从孤儿院来的

陈爱莲 著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香港分店：域多利皇后街 9 号

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
787×960 毫米 32 开本 3.375 印张 49,000 字
1982 年 11 月第 1 版 198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 00,001—32,500

书号 11002·600 定价 0.38 元

编者的话

陈爱莲同志是我国著名的舞蹈艺术家。《我是从孤儿院来的》是陈爱莲同志写的自叙体文章。她以朴素、清新的文笔，记述了自己在党的培养教育下，从一个衣衫褴褛的孤儿一步步向舞蹈艺术高峰攀登的足迹，表现了她对党的深情，对艺术的热爱和刻苦追求，也反映了她生活中的欢乐、痛苦和幸福。文章曾在《人物》1981年第3期至第5期连载，受到读者欢迎。

为了帮助读者对陈爱莲同志的舞蹈艺术有较多了解，我们特请胡尔岩同志写了《一代舞人——陈爱莲》一文，一并收入本书。谨向胡尔岩同志表示感谢。

目 录

1 我是从孤儿院来的

陈爱莲

75 附：

一代舞人——陈爱莲

胡尔岩

——我是从孤儿院来的

陈爱莲

我经常收到许多观众来信，除了祝贺我的演出成功以外，还常常问及我的生活情况、我的成长过程。我很感激大家对我的关心。

最近，《人物》杂志又约我写稿。这使我想起了过去，也想到了现在和未来。我也想起了鲁迅先生说过的话：“生命的路是进步的，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，什么都阻止他不得。”（《六十六生命的路》）于是我贸然答应下来，尽管自己文字水平不高，但盛情难却，为了满足和报答关心我的观众、为了正在成长的孩子们，也为了我自己继续“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”去……

难忘的孤儿生活

我祖籍广东番禺县。1939年11月14日（阴

历)出生于上海。1950年,我的父亲病故,第二年春天,母亲又扔下我和妹妹,过早地去世了。我一个不满十一岁的孩子,在邻居们的帮助下,安葬了母亲。不久,我就被送走了。

不知是泪水,还是茫茫的雾色,我觉得上海的高楼大厦渐渐地模糊不清了,可是三轮车仍然沿着一条狭窄的乡间小路向前驶去。道路坎坷不平,仿佛要把我幼小的心灵颠得更破碎一些。我就是坐在三轮车上告别了生活十年的家、离开了学校和小朋友们。我清楚的知道:我再也不会有妈妈了。就这样我成了孤儿,被送进了上海郊区的儿童临时收容站。

收容站是一幢不太大的二层楼房,还有一个小小的院子。那里有几十个孩子,有的年岁同我差不多,有的比我大些。老师很少,那么多的孩子根本没法照顾,所以大家都穿得又烂又脏。不久,我的头上也长满了虱子。但总算有了吃饭的地方。开饭的时候,大家都围着两只大木桶:一桶饭,一桶菜,简直比有钱人家的孩子围着节日大蛋糕还要快乐。饭菜虽不好,却是充裕的,尽管我挤不到前边去,也还可以吃饱。收容站的孩子,大部分是原来街上的流浪儿童,他们的生活能力比我

强得多。这些孩子虽很粗鲁，但十分善良，待人真诚。我刚到那里什么也不会，而且身体又弱，他们常常在生活上照顾我。直到现在，我偶然在什么地方看见大木桶的时候，还能回忆起当年的情景，也怀念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小伙伴们。

我的小伙伴大都没上过学，当他们看到又脏又小的我，居然能认识那么多字，都非常惊奇，其实，那时我只不过刚刚小学五年级罢了。我从小就少言寡语，进了收容站就变得更加不爱说话了。我很怀念我死去的父母，在梦中常常哭醒。他们的去世给我心灵上的创伤太重了，我老是在思念他们。我的记忆力简直糟透了，什么也记不住，所以在收容站几乎什么也没学到。但在我的小伙伴当中，因为他们以前读书不多，有的根本没念过书，所以我的学习成绩比别人还好一些。

收容站只有小学五年级，老师们认为我应当继续上学，于是，我离开了收容站，被送进了上海一心孤儿院。

一扇玻璃门

一心孤儿院，比收容站大的多，也阔气的多，院子中央有一个教堂式的建筑，学生常在那里开

会。还有一幢楼房，我就在那里上的小学六年级。这里的学生很多是有父母的，一部分是孤儿。所以有的学生看不起我们，欺负我们。加上我又瘦小、穿得又破又烂，头上还有虱子，就是在上课的时候，他们也敢用纸团打我的脑袋。我很愤怒，也很悲伤，可又不敢同他们打架，只好狠狠地用目光来回瞪他们。我倔强的性格，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。

我盼望着有一天我能自立，离开这里，不再受那些男孩子的欺负。记得在我去收容站之前，有一个邻居的大姐姐参加工作了。她仅仅比我大几岁，从小就同我很要好。大约是可怜我成了孤儿，她领了第一个月的工资，就带我去街上吃饭，当然不是在饭店里，只是在菜场的小吃摊子上。我很佩服她，也非常羡慕她。于是我求她帮我也找个地方去做工，这样我也可以用自己挣的钱来买吃的东西了。她答应我一定帮忙，等我再大一点，找到地方就带我去。可是一年多过去了，她也没来找我。

在六年级，我很用功。但那时我的记忆力还没有恢复，加上孤儿生活给我精神上的创伤，在班里我显得笨极了，毕业成绩很不好。接着，在一心

孤儿院，我又上了初中。

当然，我也有快乐的时候。记得在孤儿院的走廊里，有一扇门，上面装有两块很大的玻璃，站在它前面可以照见自己的影子。我从小就是个戏迷，很喜欢模仿戏里的人物。所以常常站在这扇门前模仿戏里的身段、摆一些自己认为很美的舞姿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这个大玻璃门，几乎成了我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。

我也常常站在它的面前回忆童年的一些事情：上海刚刚解放的时候，人们敲锣打鼓，唱啊，跳啊，连大人都扭起秧歌来了。我们小孩子在大人的帮助下，成立了儿童歌舞队，参加街道里的庆祝活动。在那些孩子里，我跳得很出色，大人们常常夸奖我，所以在弄堂里我居然还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。

有时我也想起弄堂附近的小戏院。每当我路过那里时，总是在那里来回的看演员们的剧照，久久不愿离去，或者在傍晚的时候，同其他的孩子们一起挤在后台门口看演员化装。

父亲在世的时候，家境还好。大人们高兴的时候常带我去看戏，父亲去世后，靠有病的母亲一个人维持生活，我知道家里生活贫困，从不敢提出



1953 年在天安门前

去看戏的要求。可我那时还是个孩子，终于忍不住了，求妈妈给我买一张戏票。那天妈妈心情不坏，真的托人买来了戏票。我一生很难忘记当时看戏的情景：我屏住呼吸，一动不动的站在戏院的角落里，徐玉兰清脆而高亢的唱腔、风流潇洒的身段，给我的印象太深了，我简直无法用语言描述当时激动的心情。

到了孤儿院，再也没有看戏的机会了，我只能在那个大玻璃门前学戏里的身段、回忆童年的生活。我应当感谢那扇大玻璃门，因为我在它的面

前，得到过不少安慰和快乐。每当我回忆在一心孤儿院的生活，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扇大玻璃门。

决定命运的一天

1952年，有一天，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去。说实话，那时候我是很怕的，因为在当时的印象中只有犯了校规的学生才被叫去。我的心跳个不停，生怕自己作了什么错事。直到我鼓起勇气，抬起头来，看到老师微笑的脸时，才平静下来。也发现除了老师外，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正在仔细的打量着我。

他们是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来招考学员的老师。我很想离开孤儿院，希望自己能考上。老师给我搬腿、下腰，并叫我模仿舞蹈动作，跟着节奏打拍子，最后叫我表演一个小品：“在地上找针”。我想起妈妈在世的时候，也常常叫我帮她在地上找针，于是我就十分认真地在地上找了起来……老师们看到我找的那么认真，全笑了。

这一天，便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，我找到新的生活，被录取了。我盼望着有一天我能自立，这一天终于盼到了。在我忧郁的脸上有了笑容，一下子好象突然长大了许多。

我坐在北去的列车上，注视着车窗外渐渐消

失的城市，心上好象卸掉了一块沉重的大石头，突然轻松了很多。我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新人，许多美丽的幻想飞进了我的脑际，我的心里也燃烧起了越来越旺的火焰，这火焰，直到今天仍然燃烧着……

我到了北京，开始了我的学艺生活。头几天由大演员们带我们去北海、景山等公园游玩，美丽的景色，令人陶醉，叫人神往。我感到经历了严冬，生命的春天终于来到了！

应当说，我很幸运。我从一开始学艺就受到名师和专家的指点。象教我们古典舞的老师白云生、韩世昌、侯永奎、马祥林等老先生，教我们芭蕾课的索尔可夫斯基、巴兰诺娃等老师，都是中外著名的艺术家。在我启蒙时期，他们的严格教导，使我在古典舞、芭蕾舞方面都打下了比较纯正的基础。

唯一的乐趣

我是个穷孩子，天天没什么可盼的，练功便成了我唯一的乐趣。孤儿的生活和环境的变化，使我隐约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，在生活和事业中，自己必须是一个强者，既然学艺就得学出个样子来，决不能落在别人的后面。这种信念至今还牢固地



和同伴一起练功
留在我的身上。

我很用功，听老师们说，干我们这一行，必须“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”。意思是说，无论走路、吃饭、睡觉，都不能离开自己的功夫。老师还给我们讲了他们学艺时的艰辛，给我的印象深极了。因此，练功的时候，别人作一次的动作，我要作二次三次。下课的时候，也不闲着。跳古典舞，手出去的时候，要象兰花一样，因此叫“兰花手”。手指要

向手背的方向掰，只要我手闲着的时候，都要用力掰自己的手指。即便在吃饭时，也要把一条腿轮流放在窗台上，练压腿。因为每天都有芭蕾课，每天还要经常掰自己的脚背，甚至在睡觉时，也要把脚搬成“旁朝天蹬”——脚趾对着头，脚后跟靠墙，用这个方法来压腿。

那时候，我简直象着了魔一样，总想比别的孩子多练些，白天练完了，晚上还要自己加班再练。老师告诉我们，要勤奋才能出成绩，要“笨鸟先飞”。我想我并不比别人笨，“先飞”不是更好吗？可是起那么早我又醒不了，也没有闹钟，我只好求一个姓尹的大演员帮忙，求他早晨叫我。他是个男演员，太早又进不了女宿舍，只好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用一根绳子拴在我的脚上，另一头放在窗外，每天早晨他拉绳子我就起来同他一起练功。当我的同伴起床时，我已经练得满头大汗了。

我也常同小伙伴们一起做游戏，但这些游戏往往也是同练功和表演分不开的。比如：大家同时搬“朝天蹬”，看谁“金鸡独立”的时间长，或模仿某个人的动作，看谁学得象等等。

除了练功外，我最喜欢的还是看老师和演员们排戏，常常随着剧情的发展，有时笑，有时流泪，

好象自己就是剧中的人物。象白云生、韩世昌、马祥林老师的《游园惊梦》、侯永奎老师的《千里送京娘》、郭兰英老师的《白毛女》、《小二黑结婚》等我都不知看过多少遍，连台词都可以背出来，至今还没忘掉。

有时候，我们也学着大演员自己“演戏”，用床搭一个台，用床单当大幕。角色的分配往往费去很多时间，女孩子都愿意演美丽的少女、善良的姑娘，谁也不愿意演坏人。记得有一次我们演《小二黑结婚》，并请老师和大演员们来看着玩。戏都开场了，可金旺没人演，一着急我竟自己演起金旺来。我演得非常认真，学着老演员的动作，眼神。老师们看了笑得很开心，还夸我有戏。孩子总是爱兴奋的，尤其是得到老师的夸奖以后。于是我又给老师表演了《秋江》中的陈妙常。就这样，我每天生活在戏剧和舞蹈之中，前辈艺术家的指导和熏陶，对我以后的表演艺术有极大的影响。

命运好象专门同我作对，正当我发奋练功，认真学艺的时候，我得了肺病。我被隔离在一间小屋子里。说真的，肺病本身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，更大的痛苦，倒是练功也被迫停止，只能休息。我怅然若失，我真不知道不练功我将怎么

生活下去。我只能一个人偷偷地在屋里踢腿、下腰，生怕病好后落在别人后面。

每当我回忆起这一段生活，心中总是充满了对党的无限感激。因为我是孤儿，领导上特别照顾我，别人每月十九元的生活费，却给我见习演员的待遇三十二元，由大演员替我管理。冬天的棉衣、夏天的单衣，以及其它生活用品，应有尽有，对一个孤儿来说，简直象在天堂里生活一样。我得了肺病，团里还给我订了牛奶，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我。没过多久，我的病就好了，我又回到了同伴中间。是党的阳光雨露使我恢复了活力，又开始成长了。

要当一个出色的舞蹈家

在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的学员班里，我第一次看到舞剧，在这以前，我不知道世界上竟会有那么完美的艺术。那时候，我们国家还没有舞剧，我一心想着去演戏或者话剧。直到我在电影里看到乌兰诺娃在舞剧《泪泉》中的迷人表演，她超尘拔俗、优美绝伦的舞姿，深深的打动了我，我才明白，舞蹈不单纯是一种形体美的艺术，而且也是深入人们灵魂深处的艺术。从那时起，乌兰